DOI:10.13463/j.cnki.jlzyy.2026.10.004

姚绍虞《素问经注节解》“错简重订”思想的运用分析

魏金韵[1]，邱 浩[2]，聂怡佳[3]，陈子杰[1,4*]

（1.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2.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北京 100029；
3.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学院，北京 100029；4.国家中医药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摘要：《素问经注节解》为明末清初儒医姚绍虞所著，系研读《素问》的重要注本，惜其注经方法研究甚少。在当时伤寒学派“错简重订”思潮的影响下，姚绍虞对《素问》的篇目、经文、王冰注及林亿新校正进行辨析节删，包括重编篇目，崇实黜伪；勘订原文，删繁存要；细究王注，斟酌取舍；辨析校正，权衡优劣。姚绍虞所创“节解”的方法，与吴崑、张介宾、黄元御、张琦注本比较，经注同勘，特色鲜明，彰显疑经与创新精神，对于《黄帝内经》学术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素问经注节解》；节解；错简重订；姚绍虞

中图分类号：R2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699(2026)10-1227-06

Analysis on the "revising textual errors and removing redundancies" thought in Yao Shaoyu's *Suwen Jingzhu Jiejie*

WEI Jinyun[1], QIU Hao[2], NIE Yijia[3], CHEN Zijie[1,4*]

(1.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Library,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Qi-Huang Chinese Medicine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4.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Suwen Jingzhu Jiejie* was authored by Yao Shaoyu, a Confucian physician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serving as a crucial annotated edition for studying *Suwen*. However, there has been limited research on his methods of annotating classics. Influenced by the "revising textual errors and removing redundancies" thought popular in the school of cold-induced febrile diseases during that period, h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re-arranged *Suwen*'s chapter structure, textual contents, Wang Bing's annotations, and Lin Yi's *Suwen* "new-corrections". His contributions involved reorganizing the chapters, retaining the authentic contents while removing the false ones; recensing the original table of contents, eliminating the redundant accounts while retaining the essentials; meticulously evaluating Wang Bing's annotations and judiciously keeping or rejecting them; analyzing Lin Yi's *Suwen* "new-corrections" and weighing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e exegetical approach for "content selection and re-annotation" pioneered by Yao Shaoyu, compared with the annotated editions by Wu Kun, Zhang Jiebin, Huang Yuanyu and Zhang Qi, proofreads both the original work and its annotations, with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highlighting the spirit of challenging classics and advocating for innovation. This approach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advancing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Huangdi Neijing*.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挖掘项目（GZY-KJS-2024-07）

作者简介：魏金韵（1999—），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黄帝内经》文献研究

＊通信作者：陈子杰，电子信箱-chenzijie2002@163.com

Keywords: *Suwen Jingzhu Jiejie* (*The Annotated Suwen with Simplified Commentaries*); content selection and re-annotation; revising textual errors and removing redundancies; Yao Shaoyu

姚绍虞，字止庵，明末清初浙江会稽人，具体生卒年不详。明亡后弃儒从医，潜心研究《黄帝内经》十余年，历时七载著成《素问经注节解》（以下简称《节解》），且云：“拙解则必会通大意而后诠释本文，或注明本文而后补出全旨，使观者融会心胸，庶不致有偏泥之害也。[1]”浙江名医徐荣斋指出“姚氏的重修，撷经文之精要，订王冰之罅漏，作为《素问》之互勘，也是一部值得参阅的书”[2]。可见是书确实值得学习研究，然今人研究不多且在于校注特色等[3-5]，同时对于其注经中所蕴含的“错简重订”思想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1 《节解》的成书背景

姚绍虞《节解》自序云：“余自甲申以后，播迁之余，无志当世，时取医经而翻阅之。[1]”可见在明末清初之际，姚绍虞由儒及医的经历与当时伤寒学派倡“错简重订”之说的方有执、喻嘉言相似，只是姚绍虞更加注重《黄帝内经》的研读。姚绍虞有感于《素问》流传日久，虽多有医家校勘研究注释，但依旧存在“后人见之不敢读，读之不能解，解之不尽明”[1]的情况，且日益严重，为此姚绍虞曰“经学之荒，无过今日矣”[1]，故开始重新整理《素问》，并调整篇次、节删经文，撰写总序，分段章句，并云：“是集或有谓余当全载原文，但于应节解处各记钩勒，庶使读者备悉源流，知经之所以节，注之所以另为解是也。”同时姚绍虞指出《节解》目的在于“但此举原所以便肄习”[1]，而不要因为是经典则不能擅自改动，否则就会出现“若仍列全文，则不特篇卷浩繁，且使读者心目眩乱”[1]的状态，于是经过姚绍虞细致的节略，达到了“非但省文，实所以豁心目也”[1]的学习效果。可见姚绍虞对于《素问》开展节略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研读，这一初衷与当时《伤寒论》“错简重订”的思想也有相近之处。同时，在《黄帝内经》学术领域当中也有分类删减经文的做法，被姚绍虞接纳。明代吴崑《素问吴注》删改经文，多被后人诟病，而姚绍虞则有所参考，如“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一句，吴崑将之移入《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而姚绍虞也持此观点，虽与《素问吴注》在具体经文移动位置前后有异，但云：“按此一节，原刻在《痹论》篇中，实与痹义无涉，必错简也。今移置于此，文义甚合云。”[1]故可以看出，姚绍虞对《内经》的研究也有了“错简重订”之基础参考，这种注经方法对于后来的黄元御、张琦也有影响。另外，明代张介宾所著《类经》将《黄帝内经》经文分类重排，偶有删减，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在“壬辰、壬戌岁”前删除“太阳、太角、太阴”姚绍虞在《节解》中也有所采纳。

2 “错简重订”思想指导下的《节解》运用举例

姚绍虞指出《节解》的做法是“言损有余，补不足，以归乎中正之节也”[1]，明确“节”的方法为“损有余，补不足”，目的在于删减调整适度，以成规范，即“中正之节”，便于研读，这可视为姚绍虞的“错简重订”的指导思想，于是“此余之所以既节《素问》之有余，而复为臆解以畅王氏所未足，斟酌损益，不自知其狂惑也”[1]，以此开展有理有据的经文节解，将“斟酌损益”视为《素问》“错简重订”之具体做法，并由此对《素问》王冰注的篇目、经文、王注、新校正四个方面进行“节解”。

2.1 重编篇目，崇实黜伪

唐代王冰在重新编次《素问》时鉴于原文具有道家注重养生之特点，加之“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对于《素问》编次进行了调整，而宋代林亿新校正时又指出“今注逐篇必具全元起本之卷第者，欲存《素问》旧第目，见今之篇次皆王氏之所移也”[6]，可见篇目顺序的调整自古就是整理研读《素问》的首要工作。故姚绍虞也根据个人经验对《素问》篇目分类及顺序进行了调整，先分为内、外二篇，目的在于“庶使读是经者，于神理所在，精思而熟玩；象数所在，则仅记忆焉可也”[1]。在篇目数目上，剔除《素问遗篇》，认为“《素问》古目八十一篇，除亡《刺法》《本病》两篇，实共七十九篇”[1]，这与明清时期《黄帝内经》注家对待此二篇的态度不一样，如吴崑《素问吴注》仅是存目、张介宾《类经》纳入经文分类实用、黄元御《素问悬解》重新节编成文、高世轼《素问直解》排入正文注解。这也反映出姚绍虞对于《素问》篇目的严谨态度。至于 79 篇的分类，姚绍虞虽说“论阴阳、脉象、治法者五十一篇”[1]，但从《节解》目录来看，归为上篇的此部分篇章实

际共计48篇，其他归为下篇的“论针灸、穴俞者二十二篇”[1]，实际为17篇；“论岁运、六气者七篇”[1]；“文辞意旨与全经绝不相类”[1]的医论研讨者7篇，合为下篇共计31篇。

在实际调整中，姚绍虞接受王冰调整篇目的方法，但重订了王冰篇目顺序，除了前5篇与王冰注篇目保持一致外，其余篇目进行了自设标准的编排，且删去每篇篇名之后的顺序，云：“已无次序，用何数目，故并去之。[1]”显示出姚绍虞重编的决心，但在现存的《节解》清康熙十八年抚松堂刻本中，姚绍虞还是保留了黄帝内经王本原目录以方便读者了解对应篇次变动。姚绍虞同时借助“内篇”“外篇”之别，使篇目从道与术层面进行了合理划分，以体现分“节”之意，并分九卷以具体归类，每卷之前加按语，梳理篇章重编分类思路，方便阅读，如将《阴阳别论》《五脏别论》《经脉别论》三篇联排，凸显“别论”之别，又将《疟论》《风论》《痹论》等相关病证的有关篇章编排更加集中，故四川名医王渭川谈到：“特别是清人姚止庵注的《素问经注节解》一书，在每卷之前都加‘谨按’，把这一卷的内容提要钩玄以阐发经旨，在每节之前，也都作扼要的提示，读了很有启发。[2]”

姚绍虞肯定王冰补入运气七篇的重要价值，对新校正所云质疑，如：“新校正疑其篇卷浩大，以为别是《阴阳大论》之文，王冰特借以补所亡之卷……但《素问》一书，凡天地所有，无一不备，七篇虽独浩大，然畅论阴阳变化自应如是，《书经》亦出于壁，太仆之语岂即诬也。[1]”指出七篇大论存于《素问》的合理性，且可以单成体系，成为一节。而姚绍虞对于《素问》原有《著至教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等七篇则认为是后人伪托充篇目之作，列入最后一卷，如云：“末后《著至教》等七篇，文辞意旨与全经绝不相类，的系后人假托以充篇目之数者。王氏一概混为之注而不能辨，直为其人所欺矣。自今道破，后之君子谅不以吾言为孟浪也。”[1]在《阴阳类论》篇解时也指出“经中论阴阳之类多矣”[1]，故仅择其要义节略注解，未全文收录。至于遗篇《本病论》《刺法论》则不予考虑。

基于以上对篇次的调整，姚绍虞一改王冰二十四卷八十一篇的编纂体例，以神理、象数内、外分篇，内篇3卷，外篇6卷，在分类重编篇目的基础上进行辨伪，以方便研读。

2.2 勘订原文，删繁存要 姚绍虞据“损有余，补不足，以归乎中正之节”的解经方法，节删了《素问》部分经文，计有以下做法。

有“于经之正意已完于前，而复赘词于后者，则去之”[1]，如《调经论》“皆生于五脏也。夫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而此成形”后，将“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删除，原因是此句之前已有对身形五脏的描述，故删除赘语。

有“经之言已见于别篇，而又重出于此者，则删之”[1]，如在《腹中论》篇解中姚绍虞言：“腹中之病也，凡八则，而今删其一。腹中之病，诚不止此，而此特其大凡耳。[1]”因环脐而痛的伏梁之证在《腹中论》《奇病论》中均有出现，故删去《腹中论》所载。

有“文词残缺，义无可考，强解之而无味者，或阙疑或尽除之，语之脱误，考别本以补葺之”[1]，如《上古天真论》末段经文有关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四人描述，姚绍虞则大段删去，这与其崇尚儒家、重视实用理念相合，故“尽除之”。

有“字之舛讹，会文理以订正之”[1]，如《厥论》“痓”字，王本误作“痤”，姚绍虞解曰：“痓音劲，风病也……全元起本作痓，后人遂以痓为痤，盖仍此误也。[1]”钱超尘[7]亦证“凡是医书中的‘痓’字，皆当改为‘痉’”。然姚绍虞却于《气厥论》“传为柔痓”[1]、《五常政大论》“其病痓”[1]等处未做改动，应有所疏漏。

有“句法之颠倒，段落之参错，凡属传写纷乱者，通上下文语气以更易之”[1]，《刺禁论》所载“无刺大醉，令人气乱；无刺大怒，令人气逆；无刺大劳人；无刺大饱人；无刺大饥人；无刺大渴人；无刺大惊人‘七种’无刺”情况，原在于“刺手鱼腹内陷，为肿”与“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中间，姚绍虞根据段落句意，指出“此七段……上下分裂，今移置于此。[1]”，放置于段末后，使得《刺禁论》全篇文意更加顺畅。

至于还有“至于后人赝托以补篇目之数，如《著至教》等七篇词句杂驳者，则为删削以贯通之”[1]，如《征四失论》“是以世人之语者，……始以自怨，遗师其咎。”《示从容论》“譬以鸿飞，亦冲于天……循上及下，何必守经？”姚绍虞均认为词句杂驳，且篇章与医理关系不紧密而删之。

经过以上删节，姚绍虞对于《素问》经文“凡

得一百七十八所，计删六千六百八十六字”[1]。可见其对《素问》经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节删取舍，判断赘余之文，有理有据，是其儒学校勘治学的体现。这种去伪存真、去粗留精的做法，使得经典研读更加通畅实用。姚绍虞此举虽有以臆节经之嫌，但其以医理为核心，注重实际研读，此种“节”之做法完成了从随文演绎的注释者转变为重构文理的修订者，旨在为“解”铺平道路，以更好地阐发经旨。

2.3 细究王注，斟酌取舍 据《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载，《节解》九卷现存清康熙十八年抚松堂刻本，徐州市图书馆藏全卷，宁波市图书馆藏仅卷一至四[8]。经实地调研，宁波、徐州二馆藏本为同一版本，在体例编排上，均将王注与姚注明确区别，王注为“单行”排列，姚注及所引诸家之论为“双行”排列，可见《节解》一书对于王冰注文也是一并纳入研究对象。据统计，姚绍虞对《素问》经文共出注解 3 857 处，直接采纳王冰注文作注 883 处，姚绍虞自注者 2 319 处，运气七篇删除王冰注引用张介宾注文 655 处。同时，以“王注”“王冰”“王太仆”“启玄子”“王氏”为关键词在《节解》中进行筛选，共有 175 处，其中对王注进行辨改的有 162 处，明确赞同王注的有 13 处。姚绍虞对于《素问》王冰注文有充分肯定之处，如云：“太仆之注《至真要大论》也，‘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原以消阴翳’二语，阐前圣所未发，开后学之颛蒙，卓然千古。[1]”也有不掩其瑕，指出“所言赘词重出者，太仆存之而未去；残缺赝作者，太仆仍之而不删；又如脱误讹舛以至颠倒错杂之类，太仆或聊且顺文而无所发明，或旁引滥收而安于浅陋。[1]”对于王冰注文的处理，姚绍虞主要有以下做法。

第一，保留王注，充分肯定。姚绍虞认可采纳王注的内容谨附于经文之后，对王冰注解精彩之处，予以高度赞誉并结合己见深入分析，在文中多有“是也”“良是”“义确”“当以注言为正”“注解精妙”“王注明确可遵”的评语，如《脉要精微论》“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王冰注“水饮既满，故渗溢易而入肌皮肠胃之外也”，姚绍虞引用王注并指出“注解‘易’字义确，《甲乙经》作溢，非也”[1]。

第二，辨析王注，训解改正。姚绍虞根据文理、医理，对王冰注文进行改正，如《奇病论》“人生而有病巅疾者”，王注作“顶巅”，姚绍虞认为“巅”疑“癫”字之讹，并指出：“今世生而有癫疾者甚多，如五痫是也。帝不言其病状何似，但言巅疾。岐伯对以得之母腹中时，有所大惊，其为癫痫明矣。若谓是顶巅之上有所疾苦，或肿或痛，或为疮疡，则又岂惊之所致。[1]”可见姚绍虞不盲从古注、不曲从旧说，揣摩《素问》经文文义、医理，结合他注，厘定王冰注文讹误，以复经文之真，在《素问》的校勘、训诂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姚绍虞《节解》阐发经义时出新意，读王注“疑而莫能明”者，多可从姚注中获得解决[9]。

第三，删除王注，择优而用。姚绍虞在整理注释《素问》有关篇章时，也会参考相关注家之论，比较优劣，以更好阐明经旨，如在《热论》中看到明代医家闵芝庆所论甚好，便去王注易为闵解，云：“向阅王注，颇不恰意，方思有以易之而未能。后见乌程闵氏芝庆者集中，特为此篇作注，最为明确，无以易也，故全录之。[1]”另外，姚绍虞虽然接受王冰将运气七篇纳入《素问》，但认为王冰对于运气七篇的注解却未能阐述到位，于是“后得景岳张公《类经》注解，推算详明，确然可遵，竟全录之，间有不合处，乃附谨按于其下。[1]”张介宾援易入医，以“推之以理”构建运气推演体系[10]，且与姚绍虞同为浙江会稽医家，皆精通儒典，故获得姚绍虞高度认可并引用其注。

由此可见，姚绍虞对《素问》王冰注文在批判继承的态度上开展了审慎的辨析与发挥，故有人提出《节解》是“对王冰本《素问》‘斟酌而损益之’”的观点[11]。

2.4 辨析校正，权衡优劣 姚绍虞对于林亿《新校正》之注，其中明引、暗引校文者较多，既有与之相合之处，亦多有补其缺漏、驳其未当、发其未发之创见者[5]。经查阅，姚绍虞引用新校正注释 229 处，对其进行辨正发挥者 15 处。姚绍虞虽由儒入医，但在医经的训诂校勘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云：“训诂大家惟以诠释本文而已，医经则独不可。[1]”指出《素问》作为医学专业典籍，有其自身特点，医理、文理均要兼顾，不能仅凭文义训诂之学或者医学之论。故对于《素问》早期的研究，姚绍虞指出：“《素问》文义虽经王氏注解，高保衡等校正，各云备极苦心矣，然错误脱漏处仍多。[1]”于是姚绍虞“兹各于本篇条下，辨驳其是非，参考

其得失”[1]，尤其是对于新校正之论也多有评价，如云“新校正非之，误矣”“偏矣”“皆非也”，观点明确，给读者以参考，而对于新校正中的“至于管窥之见，疵颣自多，削而去之，是所望于后之君子”[1]。但新校正中解读正确者，姚绍虞也是坦然接受，如《素问·汤液醪醴论》原云：“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姚绍虞认为“今详上下文语气，似有错误，按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作‘精神进，志意治，故病可愈’，文义较贯，今改从之。[1]”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畅通文义。再如在运气七篇当中，姚绍虞删除王冰注文，换以张介宾注，但是对于七篇中的新校正内容，姚绍虞进行大量辨析引用和参考，也可见其对于新校正内容的重视。

姚绍虞治学严谨，对于经文、王冰注文及新校正中的争议问题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中正”之论，并非有所偏执，对于经文“是经去古既远，残缺自多”[1]，指出《素问》流传日久，难免有所错漏；王冰注文则是“每曲为之解而理愈晦”[1]，强调王冰为注而注，导致相关解读引入歧途；而“《甲乙经》、全元起注本以至新校正亦多未确”[1]，后世不同版本解读也不能一味盲从，故“兹不敢傅会，宁阙疑焉”[1]，彰显其质疑精神，如《五脏生成篇》“徇蒙招尤，目冥耳聋……”句，姚绍虞指出“‘徇蒙招尤’四字义，王注与《新校正》解俱未确。余谓当别是一病，或字有脱误，不得以其下有‘目冥’句而即以目病为解，阙疑可也。[1]”可见姚绍虞对于经文难于理解之处，并不强加解释以求通畅，而是存有阙疑，留后人思考，以免有所误解。

经此辨析，姚绍虞对于医经校勘，独有心得，既不拘守于文理训诂条例，也不迷信前人校勘成果，而是从贯通医文、总括全篇的角度展开细致辨析，敢于质疑又严谨存疑，故为经典校读提供了很好的范式，李茂如在《医籍叙录集》中评价姚绍虞《节解》：“能独抒己见，别开蹊径，信可称一家之言。博闻兼听，庶可发蒙启悟”[12]。

3 《节解》注经思路的比较分析

明清之际《伤寒论》的研究出现了错简重订的思潮[13]，时势使然，对《黄帝内经》的注释也产生影响。现将吴崑、张介宾，姚绍虞、黄元御、张琦五家有“错简重订”注经思路的注本进行对比，见表1。

通过比较可知，在明清《黄帝内经》学术研究

表1 明清注释《黄帝内经》具有错简重订思想的医家著作对比

医家	著作	成书时间	注经思路			
			篇目	经文	王冰注文	新校正内容
吴崑	《素问吴注》	1594	保留《素问》王冰二十四卷本篇次顺序，修改2个篇目名称，仅保留《素问遗篇》篇名	删移《素问》原文错简脱讹	仅保留少数王冰注文并辨正王注之误	参考部分内容
张介宾	《类经》	1624	重新编《素问》《灵枢》为三十二卷，共分390节	《素问》《灵枢》全部经文按摄生、阴阳、藏象等12大类重新分类，保留《素问遗篇》经文，对个别经文有所节删	仅保留个别王冰注文并进行辨析	参考引用部分内容并进行辨析
姚绍虞	《素问经注节解》	1669	分《素问》为内、外两篇，共九卷，并重新编次篇目顺序，删除《素问遗篇》篇名	节删《素问》经文，修订错简讹衍	对王冰注文进行辨析取舍，保留一定数量的王冰注文；运气七篇全删王冰注文，用张介宾注文	引用大量内容并辨析
黄元御	《素问悬解》	1755	改移《素问》篇次顺序并分十类共十三卷，同时合并篇章内容，更改部分篇名，并将《素问遗篇》引移别篇内容补齐	改移《素问》原文次序，对经文有所节删	仅保留个别王冰注文	参考部分内容，个别引用
张琦	《素问释义》	1829	保留《素问》王冰二十四卷本篇次顺序但卷数改为十卷，仅保留《素问遗篇》篇名	去伪存真，去误补阙，指出《素问》错简脱衍	保留部分王冰注文并对王注讹误进行批驳	引用大量内容

领域，以吴崑、张介宾，姚绍虞、黄元御、张琦为代表的《黄帝内经》注本确实也有“错简重订”思想的存在，对于篇目、经文、王冰注、新校正均有涉及，其中以姚绍虞《节解》较为全面彻底，堪称代表，可视作对于《素问》王冰注及新校正的重订本并加以新的注释。后人对于《黄帝内经》学术中重订的做法也是褒贬不一，如汪昂在《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凡例》中评价吴崑注：“然多改经文，亦较嫌于轻擅。[14]”今人也有认为吴注考辨经文，订正王注，力求使经文归真返璞，使经义彰明较著[15]。冯承熙在为《素问悬解》作序时评价黄元御：“观其条理分明，篇第昭晰，其所移置，则若符节之合也；义意周密，脉络融贯。[16]”在今天看来，黄元御编次有擅改经文之弊[17]。对此，姚绍虞鉴于“无怪乎后人读之茫然不能解，解之懵然不尽明，甚且至于畏而不敢读”[1]的经典学习局面，遂开展“节解”，“非敢訾议前贤，良以经旨不可冒昧，人命非同草菅，宁负狂妄之罪耳”[1]，可见姚绍虞初衷依旧是更好地推广经旨，才行“错简重订”之举措。各家重订形式虽各有特点，且未形成统一认识，以至于未像《伤寒论》“错简重订”一样，形成鲜明一派，直至如今，前贤未在《黄帝内经》学术研究中明确提出。本文认为，观《节解》种种删节、训诂做法，姚绍虞可谓是《素问》“错简重订”的杰出代表，其《节解》是《素问》“错简重订”的重要著作。

4 小结

综上所述，姚绍虞尊古而不泥古，持有怀疑与创新精神，以“错简重订”思想整理注释《素问》，删衍订误，注重对王冰注及新校正的辨析与取舍，训释文本注重会通经义，不拘泥于文本，致用于临证，遗泽于后人，使得后世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和学习医经，极大地推动了《素问》学术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姚止庵.素问经注节解[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2] 周凤梧,张奇文.名老中医之路[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3] 孟繁熙.《素问经注节解》简评[J].中医文献杂志, 1996(3):17-18.
[4] 孟光.《素问经注节解》咀华[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4, 28(5):2.
[5] 罗彤,黄作阵.姚绍虞《素问经注节解》医经校勘探微[J].中医文献杂志, 2018, 36(4):4.
[6] 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7] 钱超尘.伤寒论现代研究丛刊 伤寒论文献通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3:456-457.
[8] 李鸿涛.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23.
[9] 徐荣斋,方春阳.明清间绍兴的《内经》四大注家[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 1981(4):42-45.
[10] 郎需瑞.论张介宾“医易同原”理念下的中医推理逻辑[J].周易研究, 2020(6):82-88.
[11] 陈晓.中医古典理论精华[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4.
[12] 李茂如.医籍叙录集[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9.
[13] 宁百乐,罗丁,周登威.近代岭南伤寒学派的发展概要与学术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8):3262-3264.
[14] 汪昂.素问灵枢类纂约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15] 李济仁.济仁医录[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4.
[16] 黄元御.素问悬解[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8.
[17] 翟双庆,黎敬波.内经选读新世纪第5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1.

（责任编辑：姜文君 收稿日期：2026-04-07）